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三輯

(內部發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111

N8

568

文史資料選輯

第三十三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中華書局出版

一九六二年九月

文 史 資 料 選 輯

第三十三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復興門外翠微路2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國工業出版社第二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全國新華書店經售

*

850×1168 毫米 1/32 · 9 7/16 印張 · 208,000 字

1963 年 1 月第 1 版

196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14,200 定價：(7) 1.00 元

統一書號：11018·418 63.1. 京型



編輯凡例

一、本選輯刊印的目的在于保存和积累历史資料，并推动撰写資料工作的开展。所选的資料大都是撰写者的亲身经历和見聞，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但由于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实可能不尽翔实，观点可能不尽正确，因此，本選輯只在内部作为不定期刊物发行，以供历史研究工作者的参考。

二、本選輯所选的資料，包括从清末到全国解放各个时期的历史的各个方面，~~各种~~体裁，只要有史料价值，均可选入。

三、本選輯所刊印的資料欢迎閱者提出补充和訂正。

四、本選輯对来稿可加以选录、删节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	刘文輝(1)
刘湘、刘文輝混战始末	黃应乾(59)
田頌尧、刘文輝成都巷战記	何煌榮(75)
四川軍閥最后的一場混战	陈光藻遺稿(85)
二刘大战二三事	楊学端(95)
蔣介石兩次派我入川及刘湘任	
“四川剿匪总司令”的内幕	曾扩情(106)
四川省政府及重庆行营成立的經過	邓汉祥(117)
川康整軍會議的形形色色	甘績丕(129)
抗战初期蔣介石侍从室对四川軍閥的	
調查材料	秋宗鼎(135)
蔣介石假征藏以图康的經過	伍培英(140)
蔣政权在川西边区禁烟的真相	米庆云(155)
西康鴉片流毒造成榮經事变的經過	陈耀倫(174)
四川自流井盐稅的掠夺战	杜凌云 彭惠中(187)
从法商聚福洋行到强华公司的回忆	黃瑾瑩(204)
楊氏家族与聚兴誠銀行	李維城 宮廷璋(226)
我經營重庆复兴面粉厂的回忆	鮮伯夏(263)
民生公司向加拿大借款造厂的經過	王世均(284)

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

劉 文 輝

此文所述，是我从1929年开始反蔣起至1949年起义止的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史实。这是中国社会大变动的二十年，我所经历的事情本来是不不少的，但因历年所存資料于成都解放前夕全为胡宗南部所燬，而当年經办其事的几个朋友又皆去世，故不可能全部搜集写出。这里所写的，只是脑中记忆的片断。在整理过程中，虽然曾向有关朋友广事征詢，加以补充校正，仍觉不够完整和具体，有的可能还不够准确，希望当年同道的朋友予以指正！

我走到人民陣营经历的道路，是由反蔣而亲共，由亲共而起义。我在这条道路上，前后走了整整二十年。这二十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历史时期，同时也是我在政治上由假到真、由黑暗到光明的发展过程。现在，把我走到人民陣营的历史道路扼要加以叙述，以供现代史料工作者的参考。

一 从反蔣斗争談起

我为什么要反对蒋介石呢？說实話，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1930年以前，蒋介石还在軍閥混战中处于被圍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蔣，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統一四川，控制西

南，問鼎中原。1930年以后，蔣的法西斯統治已在全國確立，并逐步把魔掌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漸轉入逆境，尤以二劉之戰（劉湘聯合鄧錫侯、田頌堯諸部與刘文輝作戰）失敗、退守西康以后，處境最艱，朝不謀夕。此后的反蔣，則是為了保持殘存的地盤，以便重整旗鼓，再圖發展。

我過去的政治支配欲所以如此強烈，這也是有其階級根源和社會根源的。1916年我在保定軍校畢業后，回到四川搞軍事，可以說是一帆風順，僅十來年的光景，便由上尉參謀升到軍長。舊中國是槍杆支配政權的。我手中掌握了一支武力，于是四川省主席也、川康邊防總指揮也、國民黨中央委員也，一齊送上了門，儼然成為川康政治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舊中國的軍人，照例是兵愈多，官愈高，政治野心就愈大；我自然也不會例外。我懂得武力是擴大個人政治局面的重要資本，故升至旅長時即開始大力擴軍。而擴軍又是和內戰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每打一次內戰就要擴編一次隊伍。川軍劉禹九、楊春芳等部幾萬人，就是在戰場上經過較量后被編併的。曾經有一個時期，被編併的隊伍比我的基本隊伍還多，形成千弱枝強的局面，要經過整理訓練，從組織上思想上徹底加以改造。我辦有各級軍事學校，從軍士而尉官、校官以至將官都須參加受訓；從而他們同我的關係，既是長官與部屬，又是老師與學生。同時我對人事任免權抓得很緊，自連級以上軍官都是由我親自選拔。凡此種種，無非是要使所有部屬都死心塌地為我個人效忠。軍隊光是有人不行，還得把它裝備好。我是從兩個方面去解決的：一是花錢向外國購買；一是自辦兵工工業。為了大量制造武器，開礦山、辦工廠、組織技術力量，曾經費了很大的事。我從小就從綫裝書上知道“為政在人”這一條，所以付出很大精力去羅致人材；最盛時期，我

这个集团的文武干部，包括十几个省籍，欧美、日本各国的留学生和国内南北各大学的大学生，无所不有。所有这一切，都得花钱，而且要花大量的钱。因此，财政问题又成为压倒一切的问题。解决的办法，主要是扩大防区。当年四川军人控制的防区都是独立王国，在经济上，予取予求，为所欲为，所以大家都拼命地争城争地。四川军阀混战十六年，大多为此。我在这方面，当然也是“当仁不让”，每打一次内战即扩大一次防区。在退守西康之前，据有川西、川南全部和川东、川北的一部。在自己防区内，苛捐杂税，人有我有，竭泽而渔，不恤民困，这是题中应有之文。而盛产盐糖的五通桥、自流井和资中、内江等地又都在我的防区内，盐糖税收为我和刘湘所瓜分。因此，搜刮的财富也较其他四川军人为多。但是我的政治局面日益扩大，支出日益增多，仍然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又开银行，办实业，进一步扩大剥削，去填补财政上的无底洞。1933年退守荒僻的西康，成了一个破落户，财政陷入极度困难，加之蒋介石又唆使刘湘在政治上给我制造了许多乱子，弄得我终日焦头烂额，无法应付；有一个时期，在无可如何之中，竟至从鸦片中去增加收入。这种饮鸩止渴的办法，曾经引起国内舆论的非议，那已经是穷极无聊了。

1924年至1932年，是我在四川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当时官居省政府主席，拥兵十几万，据有防区七十多县，等于大半个四川。由于兼任川康边防总指挥，西康地区亦为我的势力所控制。少年得志，不可一世。我后来曾用三句成语来描绘当时的心情：“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在这种物质和思想条件下，自然不愿偏促于四川一隅，一心想要从夔门以外去扩大政治局面。因此，我那时的主意是：内外并举，左右开弓，即一面在夔门以内加紧消灭敌

对势力，去实现統一四川的夙愿；一面乘滇黔軍人內訌的机会，支持胡若愚打回云南，支持王家烈打回貴州，为控制西南奠定基础。但是統一四川，控制西南，仅是我的政治野心的一部分，最終目的还在于向全国范围内扩张。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历史大变化的时期。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帝国主义的利用和支持下，互爭政权、大起內訌，不惜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推向絕地。不同的阶级走着不同的道路：被压迫的人民是投入革命，从革命斗争中去求得自己的解放；而我呢，属于反动統治阶级的当权派，自然是参加国民党内訌，从內訌的角逐中去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我认为当时国内掀起的此落彼起的反蔣浪潮，是我問鼎中原的大好机会。乃于1929年12月同唐生智等联名发出东、冬两电反对蔣介石，胁迫他下台，让我们这一羣人来掌握中国政权。这次反蔣，是承桂系和馮系西北軍反蔣失利之后而发动的。蔣在軍事上本来占上风，同时我們事前的組織工作又没有作得到家。因此，战争爆发之后，馮玉祥的西北軍态度不明，閻錫山的晉綏軍按兵不动，两湖同情我們的軍人又中途被蔣介石收买，而我的部队又远在四川，一时出不来，以致唐生智的部队在中原陷于孤軍作战，不到一个月功夫就告失败了。这个时候，我同蔣介石在政治上已经是水火不相容；但因蔣正忙于对付閻、馮，无力西顾，而我亦因向中原初試鋒芒即蒙不利，不能不沉机观变；所以彼此也就都暂时不了了之。1930年3月閻錫山、馮玉祥、李宗仁等組織討蔣联軍，爆发了中原大战，7月汪精卫北上，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与閻馮桂合作組織政府，同蔣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唱对台戏。我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决不能放过。

因此，当閻馮桂酝酿討蔣向我征求意见时，即极表赞成；并暗中积极准备出兵进攻武汉，以配合閻馮联军的中原大会战。不过鉴于前一次反蔣失敗的教訓，火色不能不看老一点，所以直到扩大會議举行的前三天，即9月6日才发出魚电公开反蔣。我滿以为这一下蔣介石一定会被打下去。誰知斜刺里杀出了一个李逵来，張学良忽然改变騎墙态度，倒向蔣介石一边，率領奉軍入关；因而扩大會議一哄而散，这次反蔣又以失敗而告終。

1930年扩大會議的夭折，是国民党内部反蔣斗争的最后一次失敗。从此以后，蔣介石成了中国的大独裁者。我曾有过两度反蔣的历史，同蔣已經是冰炭水火，摆在面前的道路有三条：一是向蔣介石投降，作他的馴服工具；二是脱离政治生活，到外国去作寓公；三是坚持反蔣斗争，从斗争中去求得生存和发展。前两条道路，同我这样一个人是格格不入的，当然不愿意走。事实上要走也是走不通的。因为蔣介石是一个大流氓，向来欺軟怕硬，你有本事整他，他便将就你；你若退让，他就叫你活不下去。势成騎虎，欲罢不能，只有走最后一条路，同蔣介石斗争到底。这就是我为什么长期坚持反蔣斗争的原因。

二 走亲共的道路

反蔣失敗，轉而亲共，亲共之后，繼續反蔣。这是我在解放前一个較长时期内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前已言之，我的反蔣，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同样，我的亲共，也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政治上的利害。因为，在蔣介石反动集团的压迫下；特别是抗日战争时期蔣的势力已經深入四川的时候，我的处境岌岌可危，如果在政治上孤立无援，就不可能生存下去；而自从

1930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以后，国民党内部的实力集团垮的垮、降的降，已经不成局面，国内可与蒋政权抗衡的政治力量只有中国共产党，除此以外，找不到其他的政治依靠。因此，我决定走亲共的道路。但是仅有主观要求也不成，同时又有极为有利的客观条件：首先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统一战线政策为一切反对蒋政权而愿意向人民靠拢的人们敞开了大门；其次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政治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革命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反动集团。正是凭借了这两个有利条件，所以我的亲共也就由假到真，即由原来利害上的暂时利用逐渐变成了政治上的长期依靠，终于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了人民阵营。

我同中共的正式接触，始于1938年，即抗日战争发生后的第二年。四川成为抗日根据地之一以后，彼此的联系日益频繁和密切。现在，就我脑中印象最深而又认为重要的事实，略述如下：

1938年夏季，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陈绍禹等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道经成都，与我会面于我方正街住所。这是我同中共中央同志第一次正式接触。当时正是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希特勒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蒋介石诱降的时候，投降主义的逆流泛滥于国民党的权贵之中，抗日形势非常险恶，所以我们这次的话题也是以如何团结地方力量，坚持抗日战争，反对蒋介石投降妥协为中心。从他们三人的谈话中，我已初步了解了党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我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经过这次会晤，我同党相互间都有了了解，为我进一步亲共开辟了一条坦途。

1939年夏天，我和董必武、林伯渠等在重庆曾家岩潘文华家第

二次会晤。时距重庆“五三”、“五四”大轰炸后不久，蔣政府的各軍政机关都已疏散下乡，抗战亡国論在国民党当权派中又复抬头。故我們这次会晤，也主要是談的有关抗日战争的問題。他們几位向我分析了国内外形势，闡釋了抗战必胜、妥协必敗的道理。尔后我对抗战胜利的信念能够坚定下来，这次晤談是有重大影响的。

1942年2月，我同中共中央领导人之一周恩来第一次見面。这次会晤，事前是通过民盟的朋友联系的。为了避免蔣介石特务的耳目，时间在深夜，地点在重庆机房街吳宅，在座只有周和我二人，約談了一小时，談完后周馬上走了。周在談話中給我扼要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指出了抗日救国的道路。他說：“当前全国人民的要求是：坚持抗日反对投降，坚持团結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而关键則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他表示：“在反对蔣介石法西斯統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意同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党密切联系，具体配合。”最后他还給我指出了努力的方向，說“团結就是力量，須在国民党内部多做团結工作，通过川康朋友自身的团結去促进西南地方民主力量的团結。”“团結是为了斗争。对蔣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須給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給以支持。”（以上是引述周談話大意）周的这一番話，使我明确了政治方向，增加了前进力量。经过这次会晤以后，我同党的关系，也就由一般联系开始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1942年6月，中共中央派王少春到雅安和我經常联系，并設有一个秘密电台与延安直接通报。王每天把党中央的方針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我傳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軍政动态向党中央

汇报。毛主席的一些重要著作和党中央的重要政策文件，我都通过电台先一步讀到了。因此，我在政治上不断受到教育，从而在实际活动中也就减少了一些盲目性。这个电台的設置，也是經過一番周折的。我事前就料到蔣介石的特务要来进行破坏，故把它安在蒼坪山下的一个旅司令部內，前面駐有一連卫兵。王少春和我直接联系，如我离开雅安时則指定我的两个參謀长張伯言和楊家楨同他联系；除此以外，王不同其他任何人打交道，以保持秘密。当电台工作了一段時間以后，蔣介石的特务即有所覺察。他們暗中由成都运来一部电台，設在雅安城內，正要进行偵察和干扰，我得报后，立即派兵搜出予以沒收；并警告蔣介石派在二十四軍軍部搞特务活动的政訓处主任丁国保說：“現有奸人在雅安密設电台，图謀不軌，我已沒收；如果以后再有此种不法行为，定要严办。”他們由于沒有抓到把柄，又加上我这一警告，以后也就再沒有在这上面搞乱了。所以这个电台一直工作到雅安解放，經歷将近八年而沒有被破坏。解放后，王少春到重庆高兴地向我說：“你的任务完成了，我的任务也完成了。”

1943年11月和1944年6、7月間，我曾派代表楊家楨到重庆和王若飞先后有过两次会晤。在那些年月里，正是蔣介石反动集团向我节节进逼的时候，不是以对藏用兵为名要把我的部队消灭于康藏高原，就是要派伪中央軍进驻西康来控制我的行动，我一年到头都在緊張中过日子。王若飞通过我的代表每次都給我分析了情况，出了主意。他告訴我，蔣介石反动集团的本性是外强中乾，我如果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蔣就会知难而退。他一再給我打气，叫我不要松勁。我听了朋友的話，坚持了反蔣斗争，終于一个个的难关被克服下去了。后来我意識到，这就是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对我的有

力支持。

1945年2月間，張友漁到成都，黨派他幫助我進行政治理論學習。他每天清早就到我方正街住所，給我系統地分析世界和中國的革命形勢，講解革命理論和黨的方針政策，連續達一个多月之久，我等于進了一次政治學校。

1946年2、3月間，正值舊政協會議閉會後不久，周恩來將要離開重慶去南京的時候，他囑民盟的朋友轉達我：“政協決議能否實現，聯合政府能否組成，要看蔣介石下一步如何走，現在還不能定。但是無論怎樣演變，鬥爭總是不可避免的，對蔣介石一刻也不能放鬆警惕。”他還叫民盟這位朋友特別提醒我，說今后的政權問題完全取決於人民的意志，如果人民不要他，誰也站不住。他鼓勵我把西康的工作做得好一點，以取得人民的支持。我体会到：周的這一番話，不僅是向我說明了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同時也給個人指明了政治前途。

在這些年月里，我在政治生活中經歷着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一方面是，如上所述，共產黨主動向我伸出友誼之手，誠懇地關懷我，熱情地支持我；而另一方面，蔣介石反動集團則視我若眼中釘，不斷地在政治上排斥我，在軍事上壓迫我，必欲去之而後甘心。這種切身體驗驅使我，同共產黨的關係日益親近，而同國民黨反動派的關係則越來越乖離了。

三 控制與反控制的鬥爭

我走上親共的道路以後，在政治上已經沒有孤立的感覺，因而反對蔣介石反動集團的勇氣也就更增加了。1938年夏季，我的代表曾庶凡從漢口回成都告訴我：“武漢守不住，蔣介石決定遷都重

庆。”我认为，蔣的大队人马一西上，首先就要控制川康地盘，而他要实现这一目的，又必然要消灭地方力量。我们则与蔣的利害恰相反，必须保持自己力量，继续控制川康地盘。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政治舞台上立足，也才有条件拥护共产党抗日；所以非拼命不可。这就使得我们同蔣介石反动集团之间的一场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的。

面对这场斗争，应该怎么办？这是我朝夕因心衡虑的问题。我知道蔣介石消灭地方力量的办法，向来是各个击破，我们要对付他，就必须团结西南地区同蔣对立的实力派，共同行动，互相支援，才有办法。同时中共的领导人也一再告诉我，团结就是力量。因此，团结西南地方实力派就成为我们反蔣斗争的重要关键。当时贵州省的地方势力已被蔣整垮，该省几乎完全为蔣系势力所控制，工作无从下手；西康省的军政大权则掌握在自己手中，当然没有问题，只是如何巩固内部而已。因此，团结工作的重点在于川、滇两省，其中四川尤为重点中的重点。因为四川是西南政治、经济的中心和西康的门户，同时又是我出生和发迹的地方，在政治上社会上有较深厚的基础，所以我人在西康，而心实未尝一日忘情于此。现在，四川已成为蔣介石的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彼此都是势所必争。而当时川省内部情况又非常复杂，事情很不好办。根据我当时的分析，四川军政界的人物，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类型：一是属于顽固派，他们是坚决反共、反人民，死心塌地为蔣王朝效忠的；二是属于中和派，他们既想做蔣介石的官而又怕蔣把他们的力量吃掉，既反共而又不为已甚，在政治上总是踟躇瞻顾，依违于拥蔣和反蔣之间；三是属于元老派，他们多年在野，大多习于明哲保身，意态消沉，与现实政治生活几乎脱节，但在地方上还有一些偶像作用；四是属于高干

派，他們是四川軍政界的高級幹部，在地方上的發言權雖不大，但是對一些地方首腦人物却有較大的影響，而且其中有些在政治上具有進步傾向，能起積極的作用。我認為，頭一派是鬥爭的對象，後三派是聯合的對象。根據這個分析和長期的體察，我覺得四川地方實力派中的鄧錫侯、潘文華是應當合作，也是可能合作的。儘管我和他們之間對政治上的看法各有不同，對四川地方的權利之爭也互有矛盾，但是大家都想保持四川地盤和自己實力，不願意被蔣吃掉，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正因為有這個共同的基礎，所以我們三人在反蔣鬥爭上是長期合作的。當然，由於個人利害上的衝突，我們在合作過程中，有時也是同床異夢，互相傾軋，但是涉及到共同的利害問題，又站到一條戰綫上來了。從1938年拒絕張羣作四川省主席的事件起到解放前彭縣起義止，中間經歷了一系列的反蔣鬥爭，我始終是聯合他們在一起進行的。

在團結西南實力派的活動中，我所注意的另一個重點是雲南。因為雲南在地理上與川康接壤，而龍雲在政治上的處境又和我大體相似，所以我特別重視同龍的合作。本來，我同龍過去的關係是不夠好的，如1929年我支持胡若愚打回昆明，就是去拆龍雲的台的。為此，多年來彼此都耿耿在心。但是蔣介石的壓迫，却給我們勾銷了夙怨，成為反蔣鬥爭的同路人。1938年6、7月間，龍雲到漢口去晤蔣介石，來去都在成都路過，我和鄧錫侯、潘文華等趁機同龍商討了川滇康三省聯合反蔣問題，大家意見一致，還簽訂了一個協定，內容大要如下：（一）一致擁護抗戰國策；（二）如有違反抗戰國策者，即為川滇康三省之公敵，共同反對之；（三）為確保抗戰國策之實現，三省在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須實行合作，關於合作具體辦法另行派員商定。龍、鄧、潘和我都在協定上簽了字。在簽訂這

个协定的过程中，因王纘緒一度参与商議，不久他就向蔣介石告密，蔣曾电龙警告，不要他干与川康事。但是龙还是坚守約言，未为所动。为了保持机密，以后即同我单独联系。龙曾派他的总參議李雁宾到雅安同我商討具体合作办法。当时成立了一个君子协定，因我先同共产党有联系，政治上由我負責，軍事上則因龙拥有較大的优势，由他負責。同时还由龙和我投資筹設正成商行，想通过这个企业来实现經濟上的合作（后因恶性通货膨胀和人事安排不善未搞成功）。共产党对我和龙云的合作很关怀，华崗曾由昆明到雅安住了一个时期，同我几度长談，主要就是为了密切我和龙的关系。事实上，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中，我同龙一直是紧密合作的。記得1944年冬季日本侵略軍一度打到貴州独山，整个西南为之震动，龙曾来电征詢我的意見，我即約集“唯民社”（我和一些进步人士在抗日战争时組織的秘密政治团体，詳第四节）的一些朋友研究了一番，答复龙：如果敌人继续西侵滇康，我們要动员地方力量抗战到底，万一抵不住，上山打游击，决不能有任何动摇。龙比复电表示同意，并各自在滇康两省作了一些动员抗战的准备工作。到1945年10月，龙云在蔣介石的武力压迫下离开云南被軟禁起来，我們的合作关系才被迫中止了。蔣介石在解决龙云的前一天，悄悄地来到了西昌。接着就給我打来了一个电报，說什麼“西昌风景优美，我兄政通人和，不胜欣羨”等等，一派鬼話。这样突如其来，我以为他要在西康搞什么名堂了。到10月3日深夜，王少春跑来告訴我，說剛从电台收到消息，蔣介石已命杜聿明在昆明出动武力解决了龙云。这时我才知道蔣来此的企图：一来是便于就近指揮昆明軍事解决龙云；二来是給我顏色看，怕我对昆明事变表示声援。他向我发出这样一个电报，則等于警告我：“这回我不整你，以后你得当心。”这确是一个